

第五卷

惠慧文集

薛永實題



惠慧文集

碑志寶題



第五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论 文

- 论女性写作中的生命意识 /3
- 论现代女性作品中的自我意识 /16
- 论女性写作中的爱情观 /26
- 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苦难意识 /33
- 论女性写作中的归宿意识 /47
- 论女性写作中的两性对抗 /57
- 论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家园意识 /66
- 论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乡土意识 /82
- 论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两性关系 /108
- 论新时期女性作品中的心灵特征 /131
- 论“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 /155
- 论男性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创作心理 /168



- 论男性作家笔下的都市女性形象 /179
论先锋实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199
对《怀抱鲜花的女人》的一种解读 /215

论

文



论女性写作中的生命意识

尽管西蒙·波娃在她的经典著作《第二性》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变成的。但我仍认为肯定有一些生物性的因素导致了两性之间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譬如细致而灵敏的感觉，女性较之于男性似乎更能细致而深刻地体会到生命过程中的丰富意味，感觉化的东西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弥漫在一些女性作家的笔下，使她们的写作呈现了更为丰富的人性内在经验。女性写作对于个体经验的强化与渲染使得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曾经招致了许多批判，那就是太过于狭隘，在自己日常的小圈子里作个人的浅吟低唱，不去关注更为宏大的社会命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女性散文的命名：“小女人”散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观念之于女性写作的一种讽刺意味。我们以为这样的评判有些主观。到了这个时代，当写作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种自由表达的时候，它便成为心灵的自然流泻。不同的写作倾向意味着关于这个世界的不同的观照方式或观照角度，虽然在形成文字之后存在一个表达的深刻与浮浅问题，但就方式而言，无所谓优劣。



—

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她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独特的语言方式和独特的经验表达构成。每一位残雪的读者都会对她笔下那个可怖的世界记忆犹新。那是一个一个噩梦,充满了黑暗而又压抑的事物。而对于我们来讲,残雪的文字和她用文字构筑的这个经验世界导致我们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她的独特感觉和语言方式吸引我们沉浸其中;但另一方面,当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我们又想迅速地逃离它,拒绝它。因为那样的小说世界对人的神经构成一种折磨。



大概是出于同样一种心态,人们阅读着残雪,但却很少有人去评价她。关于她的评论文章不多,但不是没有。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在我们阅读可及的范围内,我们觉得很少有人真正进入了残雪的世界而且读懂了她。就像一个叫唐俟的人在写残雪的评传中所说的那样:面对她的文本“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绕道走,并没有人乐于回望坐在生命废墟中的她本人的面目”。人们多半是在描述她的梦境之后追究这个梦境的象征意味。有人说这是“文革”给残雪的记忆造成伤害,所以才有了这个可怖的世界;也有人说这可能源于残雪童年时代的某些恐惧记忆,才使得她长大之后去诉说那些记忆。

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都让残雪失望了。残雪自己说,对

于我的作品,可惜,一般人都难解其中之妙处,因为大家的视线很难达到某个隐蔽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作者在进行着自认为最真实的人生表演。这个表演,作者分明看见在某种可能性下,它与每个人是生死攸关的,但又分明看见国民眼中那无神的反应。

那么残雪的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对我们而言这样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我想至少有以下两点是值得提示并引起注意的:首先,的确如一些人所说,在残雪的心灵里面必定堆积了某种沉重而灰暗的记忆,使她噩梦不断。但是我们以为,对这种记忆的具体来源作追究是不明智的。它究竟来自于童年的记忆还是来自于“文革”的可怕经历?这种带有考证色彩的追问只会引领我们走向一种狭窄的解读。这种记忆或许正是女性内心深处非常压抑的一些东西,它既抽象而又模糊,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背景,而残雪以她个人的方式对这种尖锐化的经验作了某些层面的传达;其次,必须强调的是残雪一直执著地呈现如此的记忆与经验不是为了展览,也不是单纯的宣泄,而是恰恰相反,为了埋葬,为了忘却。因此,可以用“心灵的墓地”去概括残雪,概括她笔下的那个独特世界,她的写作事实上是一次“为了忘却的记忆”。

在阅读了残雪的小说之后,你会发现在她所创造的小说环境里几乎从来不会出现有色彩的东西,全是一幅幅的黑白画面,而且是灰暗、压抑的黑白画面。与此相应的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也以一种极为压抑的状态出现。他们无

一例外的或者外貌丑陋,或者神秘诡异:火葬厂的炼尸老人每天趴在天窗上窥视着什么(《天窗》),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也是互相出卖与防范(《山上的小屋》)……那么,一个可以想见的事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这群人的精神状态总是处在一种紧张、焦虑和压抑之中。

残雪笔下的人物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健康的,更没有一丝美好的个性特点可言,即使像“母亲”这样一个被人们定义为宽容、圣洁、博大的温情脉脉的形象,在残雪的笔下也变得委琐不堪,不可理喻,那是一个被糖尿病折磨得老迈臃肿的女人(《天窗》),那是一个总是偷窥女儿隐私,翻看女儿抽屉的女人(《山上的小屋》)……这就是残雪小说中的世界,进入其中就像坠入了无边无际的可怕梦境。

在这里,想说的是,与她的文本世界的表层话语恰恰相反的是,残雪是用这样的文字固执地寻求着一种明亮与美好的感觉,抑或情感。就像她自己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的那样:“我敢说在我的作品里,通篇充满了光明的照射,这是字里行间处处透出来的。我再强调一句,激起我的创造的,是美丽的南方骄阳。正因为心中有光明,黑暗才成其为黑暗;正因为有天堂,才会有对地狱的刻骨体验;正因为充满了博爱,人才能在艺术的境界里超脱升华……”残雪以她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与体验,这就是她的意义之所在。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残雪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并非全是无休止的猜忌与伤害,也有美好的情感,比如爱情,只是

极少,或者被我们忽略了,因为她采用的同样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天堂里的对话》这篇小说实质是立足于“我”这样一个角度对“你”的爱情。那爱情宽厚而又深刻,让“我”留恋不已。但残雪没有用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爱情表达词语,只是在“我”的叙述中,读者感觉着这场爱情的深刻意味:当“你”在门外的时候,“我”就不会做噩梦,否则,会有一个黑衣人在深夜来到梦中,撕扯着我的头发……这当是我们所阅读到的关于爱情的最为独到而又深刻的描述。

而正是这些构成了残雪小说独特的审美效果,并因此使她成为新时期小说写作中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一个。当然,在她把她的人物推向无可回头的绝境的同时,她也把自己放置在了一个孤独的境地。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她拒绝了通俗意义上的小说的可读性,那么也就拒绝了她的读者。



二

如果说残雪在自己的小说中将那种焦虑、压抑与恐怖的体验传达到了极致的话,那么,在一个时期,陈染的小说则把一种精神的绝望与孤独表现到了极其深刻的地步。有位评论家曾说过,陈染的小说里的那种孤独感可以杀人。我亦有这种感觉。陈染像一个孤独的思考者,把自己封存在一个远离人群的空间里,忧郁地诉说着自己的心灵。

似乎陈染早已认同了自己这样一种孤独的宿命:命中注定,我永远是个被人类之声所隔绝和遗弃的人。我们在陈染的小说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女人独自一个人坐在静

寂的黑夜里写作,水龙头的滴答声和清脆的键盘敲击声使得这样的孤寂更加深远而清晰。

在陈染的小说中,那些女主人公较之一般的女性显然更细致地品味过那种无路可走的绝望。在一篇小说《麦穗女与守寡人》中,主人公对自己的绝望情绪作了这样的描述:“能够叫喊出来的绝望其实是一种激情,而只能把它密封在心底,你必须在众人面前装做什么也不曾发生,你只能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绝望。”那些拥有美丽而奇特的名字的女性们在世俗的生活中就像她们的名字一样孤独、怪异、卓而不凡:黛二、蕙馨、寂旃、麦弋……由于家庭的不幸(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和最终离异),少女时代的她们就养成了孤僻、抑郁的个性,在走向成人的过程中,生命中的一系列的经历继续强化着这种性格,充满着背叛、欺骗、侮辱与伤害的生活让她们害怕人群,并开始远离人群,一步步走向自我封闭的深渊。

写作与读书——独自一人在紧闭的房间里写作与读书成为她们全部的精神逃亡,同时也是她们抵抗绝望与孤独的唯一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导致陈染小说中的女性常常拥有一些无论如何都无法走出的心理情绪,比如:“秃头情结”、“九月情结”、“恋父情结”、“同性恋情结”等等。在陈染的故事中,“九月”是一篇永远无法打开的怪门和死门,是“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九月”意味着一次情感的破碎和爱人的离散。在“九月”之后,麦弋剪掉了如云的黑发,实现了她的“秃头主义”;在“九月”之后,寂旃经历了一场混

乱不堪的梦境;在“九月”之后,“我”彻底告别了“我”的处女时代……在这样一些纠缠的情结之中,女性主人公时常走向她们绝望与孤独的极致。

不同于残雪让噩梦结束以体会现实上的轻松与感动,陈染为她的主人公选择的是自虐和苦思冥想,或者让更激烈的伤害彻底占据自己的心灵,或者让自己沉浸于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之中,以逃避现实的伤害。

常常可以看到,在小说中,陈染对自虐方式与情绪的安排决绝而又彻底,不留一点余地。那个十六岁的少女在经受了父亲的耳光和心灵的破碎之后请求一个男人对她进行蹂躏。在相互之间灵魂的撕扯与残忍的伤害中她走向了世界的末日,但同时也在“令人绝望的振奋之情”中走向最后的平息,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自我拯救方式(《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

当再次阅读陈染写于一九九三年前后的一组短篇(包括《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饥饿的口袋》、《麦穗女与守寡人》、《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等)时,我吃惊地发现陈染以如此集中而决绝的态度完成着对自虐的展示,几乎在每一个故事中都有一个伤心与背叛,或者莫名的离散与错失,这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使得那些女性走向对于更为深刻的悲剧的直面与咀嚼,并在其中体会着自虐的某种绝望的快感。所以我们在陈染的小说中常常会遭遇到这样的疼痛:最好的朋友又恰恰在最后与别人合谋,完成了背叛与逃避;在看似轻浮的玩笑中恰恰蕴含着最深刻的

爱恋,但在明白之后再去追逐时,却是永远地擦肩而过(《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似乎只有在这样不留余地的伤害和对伤害的面对与承受之中,陈染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才能从绝望与孤独的极致中获得心灵的平息。

在陈染的小说中,缓解孤独的另一方式是冥想。在那些多半是第一人称作叙述者的故事里,你会发现任何一种细微的事故都有可能让一个女性沉湎于幻想之中,或者说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引领她们走进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的契机:猝然而逝的性伙伴(《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深夜里突然而至的诱拐(《麦穗女与守寡人》);从楼上飘然而下的美少年(《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那是一种梦幻式的呓语,就像那个叫麦弋的女性剧作家对自己的恍然了悟:多年来她与任何一个“他人”的接触,无非是自我的交谈。冥想现象在陈染的小说中的过多出现显然和作家陈染的丰富的想像力有关。这种想像力有时指向完全的虚构,有时则指向对旧事物的再造。

有些时候陈染自己也对自己的虚构能力表示吃惊:“我恐惧地看着我故事里伪造的第一人称,我不知她是谁。因为我天生是个作小说的人,所以我的任何记忆都是不可靠的。在蓝苍苍的恬静的夏日星空下与在狂风大作的冷冬天气里,追忆同一件旧事,我会把这件旧事记忆成两个面目全非彻底悖反的两件事”。同样是这样的冥想能力使陈染笔下的女性成功地抵御了孤寂与绝望的浸泡,成为她们心灵的有效停泊地。

我们从来就不把陈染看成一个性别视角的作家,而更看重的是她那种超越性别意识的玄想与带有妙趣的哲思。亦如她所说:“一个人可以沉醉在思想里,安谧的精神像一朵云彩由天上降下来。”“当然,我以为一个优秀的女性,特别是一个女性的作家,她不仅拥有可感、可能的感性方式,同时她也应该具备理性的、逻辑的、贴近事物本质的能力。也就是说,她不仅用全身的肌肤写作,而且她也用她的脑子写作。”“一个女性作家,只有把男性与女性的优秀品质这两股力量融合起来,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感情与思想转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不可言说》第198—200页)

我一直认为陈染的文本的魅力就在于她那独出心裁的语言背后的那一种直面灵魂的思考穿透力。陈染的小说文本中一贯渗透着一种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的获得,又使得她的作品与其他的女作家拉开了距离。关于这一点,著名评论家丁帆曾经在评论《私人生活》时作过分析。

作为现实生活的“可耻的孤独者”、“生活在别处”的异乡感使得诗人般敏感的陈染对人生有了更加透辟的了悟:“一个异乡人,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身处他乡。你心里漂泊着,还思念或牵挂着什么——一个人真正孤独的时刻,就是一个异乡人。”(《声声断断》第12页)一个坚决与生活不和解的人,才能获得玄思的想像力,才能具有生命的鲜活性。

陈染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但是我们还是固执地认为她的骨髓里浸润着浪漫的细胞,不过这与当下许多浪漫、伪贵族作家相比较,恐怕陈染式的真诚更加能赢

得真诚的读者。“我一直对现实主义缺乏兴趣,但纯粹的浪漫主义不免失之天真。我想,如果浪漫主义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砺一番之后,再加上现实主义的作料,便是一种出色的境界了。”(《声声断断》第39页)

作为九十年代的“私语化”、“个人化”小说的代表作家,陈染的作品与上一代女作家王安忆相比,有了太多的不同。体现了更私人化的情感,她的作品中没有了那种对整个群体的人性关怀,内敛与收缩成为了方向。在陈染小说中,女性内心细微的变化更加夸张和放大,甚至不惜用一种近乎病态的、残酷的方法去表现女性的内心世界,但是同现在的“另类”作品比较起来,她的作品却显得那么温和而委婉,没有“另类”们那种肆无忌惮,狂妄自大的倾诉,甚至可以称作“嘶吼”的情感宣泄。

三

每一次对于《玫瑰门》的阅读都会给我们带来关于这部书的震惊。即使是在今天,当再次站在当下状态观望整整二十年的女性写作的发展历程时,一个不可忽略的转折点仍然来自于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转折,也是迄今为止最富有革命意味的转变,是新时期的女性写作中,对生命经验的书写,是超越于个体经验之上对女性群体的命运所进行的反思和审视。

《玫瑰门》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对女性生命的深刻洞察、理性反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女性生命的真实开掘、剖析与

展示的努力。《玫瑰门》是“生命之门”，同时又是“女性之门”，铁凝正是借助三代女性的命运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女性生存的图景。她们对于这种与生俱来的性别规定性的反抗与逃离以及失败之后的挣扎，在这场挣扎与争斗当中，性别因素既是她们悲哀命运的渊源，有时又是她们的手段，“玫瑰之门”是她们进入的终点，又是她们逃离的起点。

从拥有生命的那一刻起，这些女性们就开始了她们备受压抑的日子，她们在被消耗中学会了消耗，在被压迫中学会了压迫。《玫瑰门》中的女性是多面性的女性形态，这带来了这部作品意蕴的复杂层面，如果必须用一句相对简明的话概括《玫瑰门》中女性生命形态的话，那就是她们几乎全部是变态的女性，或多或少，在她们的心灵深处，都存在着某些畸形的东西；但同时她们又是绝对真实的女性，当我们借助《玫瑰门》中的揭示去观照这个现实意义上的性别群体的日常生存时，我们终会发现那些隐蔽的同时又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相似性。

在铁凝笔下的这个群体中，首当其冲的主要角色应该是司绮纹。这个出身官吏家庭，先是接受了正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又在教会学校被现代文明熏陶的女性，最初并不缺乏对旧家庭的反抗素质。她生命中最初的，也是最决绝的一次反抗无疑是她对自己十八岁遭遇的那场爱情的捍卫：她一意孤行地与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一个叫华致远的革命者建立恋爱关系，直到华去农村发动斗争，她用奉献自己少女的贞洁作为自己毅然决然的行为标示。但她的家教使她没有